



联合 国  
安全理事会



PROVISIONAL

S/PV.1816  
25 February 1975

CHINESE

第一八一六次会议临时逐字记录  
一九七五年二月二十五日，星期二，下午三时  
在纽约总部举行

主席：黄华先生 (中国)

出席：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 契尔努申科先生

哥斯达黎加 萨拉萨尔先生

法国 勒孔特先生

圭亚那 斯托比先生

伊拉克 扎哈维先生

意大利 普拉雅先生

日本 斋藤先生

毛里塔尼亚 凯恩先生

瑞典 里德贝克先生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马立克先生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理查德先生

喀麦隆联合共和国 布布先生

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 卢韦耶马穆先生

美利坚合众国 斯卡利先生

本记录包括中文发言的原文和其他语文发言的译文。定本将尽快分发。

更正应只对发言的原文提出。更正应作在印发的记录上，并于三个工作日内，  
用一式四份，送交会议事务部正式记录编辑科科长（LX-2332室）。

本记录是在一九七五年二月二十六日分发的，提出更正的时限是一九七五年三月三日。

请各国代表团严格遵守上述时间的限制。

下午四时十五分，会议开始

通过议程

议程通过。

塞浦路斯局势

一九七五年二月十七日塞浦路斯常驻联合国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S/  
11625）

主席： 按照第一八一三次会议上所作的决定，如果安理会同意，我建议邀请塞浦路斯、土耳其和希腊的代表参加讨论，但没有表决权。

应主席的邀请，塞浦路斯代表克莱里季斯先生、土耳其代表奥尔查伊先生和希腊代表卡拉扬尼斯先生在安理会议席就座。

主席： 按照安理会第一八一五次会议上所作的决定，我现在征得安理会的同意，邀请保加利亚代表在安理会议厅旁边保留的座位就座，以便参加讨论，但没有表决权。

应主席的邀请，保加利亚代表格罗泽夫先生在安理会议厅旁保留给他的座位就座。

主席： 现在理事会将继续审议塞浦路斯局势。

斋藤镇南先生（日本）： 主席先生，我希望利用这个机会祝贺你担任二月份的理事会的主席。你已经优异地主持过理事会会议。我有信心，黄华大使，以你的极大智慧，你将在未来的日子里能干地指导我们的讨论。我也不欲忽视上个月的理事会主席，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常驻代表契尔努申科大使的能力。

在他当主席期间没有举行过会议，如果有会议，他的外交天才对理事会会有很大的帮助。

日本代表团非常感谢你的热烈欢迎。我们感到很荣幸能够回到理事会。我也要向苏联的马立克大使表示感谢，因为他对我国代表团致词欢迎。我也希望谢谢法国代表，因为他的代表团曾善意表示愿和今年在理事会就座的各代表团合作。

我们很清楚我国作为主要负责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的联合国机构的一员所负的责任。作为大会选出来就联合国亚洲会员国的一席的一个亚洲国家，我们将尽最大努力来反映亚洲国家在本伟大组织内促进世界和平的愿望和理想。

我代表我国政府，希望向理事会保证，日本将竭能力所及、尽一切可能和理事会的各成员合作，以帮助解决现在理事会面对的或将来几年中会提到理事会来的国际问题。

日本代表团感到很遗憾，塞浦路斯共和国的局势近来变坏了。自从土族塞人社区领袖登克塔什先生二月十三日的声明宣布“在政教分立的联邦国家的基础上”建立一个自治的土族塞人结构，在新的联邦宪法下作为塞浦路斯的一部分以来，两个塞人社区间的关系就严重恶化了。

塞浦路斯常驻代表在请求召开安理会的紧急会议时指控土耳其违反了关于塞浦路斯问题的联合国政策的两个最近基本文件的规定：大会第3212(XXIX)号决议，和赞同这项决议并请秘书长就该决议的执行进展情况提出报告的安全理事会第365(1974)号决议。

一九七五年二月十八日S/11624号文件中所载的秘书长关于塞浦路斯事态发展的特别报告的附件中载有塞浦路斯和希腊政府答复秘书长信的文本。这些答复提出了保证，说他们在努力执行大会决议的规定。在这些情况下，日本代表团全心全意地支持秘书长到雅典和安卡拉和希腊及土耳其政府讨论塞浦路斯问题的主动。

我国代表团很有兴趣地听取了上星期五在本会议厅里秘书长就他到这两国访问的结果拟出的一般结论。

日本代表团全心全意支持大会一致通过的第 3212(XXIX)号决议，以及无异议通过的安全理事会第 365(1974)号决议。两个塞人社区以及，无需说，各有关国家，都应该尽最大的可能来遵照大会和安全理事会通过的决议中的规定，这在那时和今天都是我们考虑过的意见。安全理事会决议促请有关各方尽早执行大会的决议。大会决议要求各国“尊重塞浦路斯共和国的主权、独立、领土完整和不结盟，而且不对它进行任何行动和干涉”，并且它也说出“塞浦路斯共和国的宪法体制关涉希族塞人和土族塞人两个社区”。

关于最后一点，我要回顾一九七四年十月三十一日辩论塞浦路斯问题时我在大会所作的一个相关的声明。我说过：

“我国代表团认为虽然有关各方对许多重要问题的看法相差很多，但是它们都同意了中心的和最重要的原则，就是任何解决必须根据尊重塞浦路斯共和国的主权、政治独立和领土完整。它们也同意了反对塞浦路斯的任何形式的划分，或另一国对塞浦路斯或其任何一部分加以合并。这些原则应该是为这个复杂问题产生解决办法的一切努力的起点。”(A/PV. 2273, 英文本第 11页)

鉴于目前的局势，我们认为大会对两个社区的代表那时在秘书长的斡旋下，在“平等基础上”进行的接触表示嘉勉，是特别有价值的。大会的进一步声明说“所有难民应该安全地返回他们的家乡”，并且建议有关各方采取“达到此目的的紧急努力”，我国代表团认为也对一切为岛上受尽苦难人民的福利寻求一个人道的和永久的解决办法的人给予好的印象。

我国代表团也愿确认对一九七四年七月二十日通过的安全理事会第 353(1974)号决议的支持，当时严重的暴乱和流血事件的爆发已经产生了其中所说的“整个东部地中海地区最具爆炸性情况的局势”。那时的不幸事件导致安全理事会在决议中列入停火的呼吁，并请求所有国家避免采取任何可使局势进一步恶化的行动。此外，决议要求有关国家——希腊、土耳其和联合王国——毫不迟延地进行谈判

“以期恢复该地区的和平和塞浦路斯的符合宪法的政府”。

实际上我国代表团愿同意安全理会在这个问题的这个新的和危险的阶段中所通过的一切相关的决议。我们要促请理事会采取一切可行的措施以恢复谈判，使这些决议能得到充分执行。

关于恢复谈判，我首先愿强调我们的坚定信念，就是不论同意那一种的谈判范围，谈判的核心必须是两个社区之间的直接会谈。我重复我们的坚定信念，就是不论同意那一种的谈判范围，谈判的核心必须是两个社区之间的直接会谈。除非两个社区间维持充分的联系，否则无法达成一个互相可以接受的政治解决。有人提出一个建议，即谈判的范围应该扩大，让第三者参加。要考虑这个方法的可行性，在调解努力中起主要作用的秘书长的观点应该得到重视，而且自然必须得到双方的同意。无论如何，我们促请一切有关国家不要危害这对话，而要帮助其产生成果，并尊重谈判中自动达到的成果。

第二，联合国必须恢复因会谈停顿而失去的已有进展并帮助各社区寻求恢复谈判的方法。要表示我们希望恢复会谈是容易的，然而我们都知道要解开产生会谈停顿的棘手问题却是很艰难费力的事。

因此最重要的就是创造一个有利于恢复建设性谈判的环境。既然各有关决议的根本精神是和解与互相谅解，我们愿表示出我们的真诚希望，即在有关各方的积极鼓励之下，各社区会尽最大的努力来为重开对话铺路，并探索互相可以同意的保卫塞浦路斯的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的方法。

我确信各代表都会同意上周秘书长给理事会的说明（第一八一四次会议英文本第6页），即为了完成那个目的，需要有“趋向谈判过程的新鲜途径”。我希望他们会全体共同提出一个新的途径，可能包括新的方式，以便实现秘书长的有价值的建议。理事会可以考虑下列的意见。

第一，也许值得探讨一下在塞浦路斯以外的一个地方，在一个不同的环境中，

去恢复谈判过程的可能性，如果有关各方可以同意的话。

第二，我国代表团的真诚希望是理事会将请求秘书长加紧努力以帮助两个社区间重新此种会谈，而且理事会将继之以充分支持那些努力。当然，会谈应当在秘书长或他的特别代表在场时进行。

第三，我国代表团也认为这是重要的，即要求秘书长迅速将谈判的结果报告给安全理事会，包括各有关决议的执行进展情形，并且安全理事会应该尽快评估他的报告中所载的情报。

从理事会面对的情况的性质来看，有关各方的会谈似乎会集中于政治问题。可是，我和瑞典代表持有同样的见解，他说迫切的人道问题的解决不应该等待先对继续谈判应采取的方式有了同意，更不用说等待先已达成了一个政治解决。我国代表团深信塞浦路斯问题的两个方面都应该得到充分考虑。让我们希望理事会会明白表示在各社区代表间的任何会谈上，应该对不幸的难民的苦境给予适时的考虑。

我们对于联合国的作用寄予很大的希望，如同秘书长在提供斡旋和协助缓和紧张局势以及塞浦路斯问题的最终解决的最近努力中所具体表现的。

我们强烈敦促一切有关各方和国家在将采力行克制，避免争端的任何扩大。我们请求联合国的一切会员国，特别是安全理事会的成员国，尽量帮助有关各方和国家有效地和顺利地实现联合国的目的。我愿代表我国政府提出一个保证，即日本将欢迎和支持一切为了解决塞浦路斯问题的迫切阶段而作出的真诚努力，让我们希望，随著这些努力之后会有一个以我提到过的各联合国重要决议为根据的永久解决办法。

布·布先生（喀麦隆联合共和国）： 主席先生，我代表我国代表团，想对你担任安全理事会二月份主席的重要职位，表示热烈的祝贺。 并祝你完全成功地达成你需要慎重处理的任务。

我也很高兴地要向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的契尔努申科大使表达我国代表团深深感谢他在上月份担任安理会主席时，机智而有效地完成他的任务。

我国代表团也想借这个机会向澳大利亚的麦金太尔大使、奥地利的杨科维奇大使、印度尼西亚的安瓦尔·萨尼大使、肯尼亚的马伊纳大使和秘鲁的德·奎利亚尔大使致以应得的敬意，他们在安全理事会任主席的期内，都曾以才智、能力和热诚对寻找本机构所面临的困难问题的适当解决办法，有所贡献。

我国代表团也想对圭亚那、日本、意大利、瑞典和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的代表致以热烈欢迎，他们的国家刚刚被选出参加安全理事会。 我现在就可以告诉他们，在我们今后的工作中，他们从我国代表团的合作与了解就可看出幸运地存在于他们的本国政府和喀麦隆联合共和国之间的良好关系。

当上次安全理会在一九七四年十二月十三日审查塞浦路斯问题的时候，我们不无理由相信面临该岛十年或十年以上的困难问题，即将以和平方式彻底解决。

实际上，大会刚刚才一致通过了第 3212(XXIX) 号决议，以我国代表团的看法，这项决议所载条款如果被有关团体忠实执行的话，即可能迅速回复和平。 此外，塞浦路斯依宪法选出的国家元首，也在社区间的谈判在某些方面有著令人鼓舞的转变时，回到了他的国家。

这些有利情况，不幸由于某些国家对塞浦路斯共和国内政上越来越明显的干涉而似乎受到了严重损害。

第 S/11624 号文件内所载的本组织秘书长热诚提供给安全理事会成员国的杰出报告和他在上一个二月二十一日在此所作的重要声明，以及直接有关各方在此所

作的声明中关于最近事件的说明，明白地显示近几个月来，对于塞浦路斯危机的政治解决，并没有达成进展。与此完全相反：二月十三日有关土族塞人自治政府的声明，对许多国家来说，代表著对一个联合国会员国独立和领土完整的严重和直接威胁。一九七五年二月二十日和二十四日切里克先生在安理会的声明已不足以使安理会的成员国对这个事项感觉安心。

鉴于这些事件的极端严重性，我想重申我国政府对这个塞浦路斯问题的原则立场。

喀麦隆联合共和国坚决支持马卡里奥斯大主教的合法政府和全体塞浦路斯人民在该国人民为了保卫塞浦路斯共和国的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基本权利而从事的英勇正义斗争。因此，我国政府不能赞同非基于全体塞浦路斯人民自由和明确愿望的任何分裂该国的企图。

我国政府仍然深信，所有国家对塞浦路斯的独立和不结盟政策的绝对尊重，以及撤出该岛所有的外国军队，是对这件令人担忧的事件的实质举行严重谈判的必要先决条件。

只有希族和土族两个社区的塞浦路斯人才担负着成败所系的任务，可以绝对自由并在平等地位上决定何种的国家宪法形态最能促成他们的幸福以及对于他们基本和合法权利的尊重。因此，我国代表团以友善的方式促请他们照已经在此表示过的意愿，不要再打开旧的创伤，而要加倍努力以找出一项解决他们国家宪法问题的建设性、公正和互能接受的方法。任何其他国家、任何国家集团绝都不能在这方面剥夺塞浦路斯人民不可分割的权利。

我国代表团认为塞浦路斯这个不结盟国家必能保持其独立自存的权利，这一信念使得我们毫无保留地支持大会一致通过——所以也就是经希腊、土耳其和塞浦路

斯政府同意——并经一九七四年十二月十三日安全理事会第365(1974)号决议所一致同意的第3212(XXIX)号决议。这些到今天还切合实际的决议条款即可为有关各方的讨论提供一项重要的根据，这当然是说假若最后解决这项问题的善意和政治决心能战胜民族自私心的力量的话。

终止塞浦路斯人民无可言状的痛苦，现在正是到了时候了；使该国回复真正的和平，现在正是到了时候了。以武力来分割塞浦路斯共和国，不仅对该国人民是真正的悲剧，就是对于本组织内希望能自由和独立生存，而不致因军事和技术装备较好的国家的奇想和侵略而成为牺牲品的全体小国来说，也是真正的悲剧。因此，我国代表团的意见是在目前的情形下，对于不以武力攫取一国的领土的原则，必须加以明确的重申。

如果安全理事会不采取具体而有效的措施，以保证充分而迅速地执行有关的决议，并维护本组织会员国之一的独立的话，世界人民对联合国的信心即将受到猛烈的动摇。

就这方面，我们全心全意地同意秘书长在二月二十一日于安理会中所表示的意见：

“……塞浦路斯问题是对本组织效率和信用的严重考验。”（第1814次会议，英文本第3—5页）

安全理事会今天很可以有效地尽到责任去解决塞浦路斯危机。实际上，奠定协商解决塞浦路斯危机的基本原则的大会第3212(XXIX)号决议和安全理事会第365(1974)号决议，都是经本组织的会员国一致通过的。这项事实本身应足以鼓励安全理事会在辩论的现阶段采取更大胆的行动。

虽然我国代表团在现阶段对于应采取何种具体行动尚无明确的意见，但是我们

随时都愿支持安理会对各方可能发出的呼吁，要求他们不宣布采取单方面行动对未来的谈判结果做出事先的预断。我国代表团也同样地愿意支持安理会同各方协议之后所制定的任何方式，以定出实际的安排来撤退该岛的外国军队，这正如第3212(XXIX)号决议所建议的，是使各方继续其完全自由的并且在平等地位上进行的谈判的先决条件。我国代表团要再度表示它对秘书长的信心，我们鼓励他依照安全理事会所定出来的任何新的安排，在塞浦路斯事件上继续他的斡旋使命。

当然，我们也准备审查安理会成员国为了创造有利条件以便恢复有关塞浦路斯问题的建设性谈判所可能提出的其他措施。

最后，我要大家明了我国政府对塞浦路斯问题的原则立场，正如我刚刚解释过的一样，对任何直接或间接有关的一方都是没有什么偏见的；所有这些方面的合法利益都值得我们作同样的考虑。

我国政府对此事的关怀，基本上是根据同维护和平与正义有关的考虑。实际上，这就是喀麦隆联合共和国外交部长在他对联合国第二十九届大会的声明中所说明过的考虑。他说：

“……我国代表团认识到继续存在于塞浦路斯和一说真话——整个东地中海的紧张情势，将赞成和支持无论哪一方面所提出的倡议，只要它趋向于肯定恢复该岛的和平，并为了该岛希族和土耳其族社区的利益而同样肯定地解决因一个安排失败之后所引起的政治问题，而此一失败是我们深感遗憾的。”(A/PV.

2257，英文本第31页)

普拉雅先生（意大利）： 主席先生，首先请容许我对你担任安理会主席表示我国代表团的贺意，并借此机会回顾我国与贵国维持的友好关系。 我国代表团将诚恳地支持你行使主席的职责。 我也愿和大家一起向你的前任，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的契尔努申科大使致谢。

此外，主席先生，对你本人和同你一样在意大利开始再担任安全理事会的理事国时对我国和我本人表示欢迎的其他代表，我要特别表示感谢。 我国很高兴能够同圭亚那、日本、瑞典和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一同开始担任这个职务—— 我国同这些国家有特殊的友好和合作的关系—— 我要对它们的代表，以及常任理事国的代表表示欢迎和祝愿。 我也赞同大家向刚卸任的理事国—— 澳大利亚、奥地利、印度尼西亚、肯尼亚和秘鲁，和以他们对安理会工作的具体贡献赢得本组织感谢的这些国家的代表，致以理所应得的敬意。

如我国政府所经常强调的，意大利极为重视本组织。 因此，我国非常注意随安全理事会理事国地位和参加安理会工作而来的职责。 安全理事会将被要求对不幸地继续发生于全世界各地的危机首先负责处理；因为安全理事会必须通过各国的协调行动—— 特别是有能力提供最有效贡献的那些国家—— 在一个以深远的变革和各国之间相互依存为其标志的国际气氛中，履行任务谋求以正义为基础的长远的解决办法。

意大利遵循著宪章的原则，决意尽可能地为安全理事会的工作作出最有效和最诚恳的贡献，通过消除国际争端的根本原因来从事旨在谋求全世界和平的外交活动。 我要向各理事国保证：安全理事会可以信赖意大利代表团在履行这一任务时所表现的积极的、极其认真的合作。

意大利向来深切关注塞浦路斯局势的发展。 这一局势对地中海东部—— 一个很靠近我自己国家的地区的安定，留下持续性的危险。 它在和我国有密切联系的

各国之间带来严重的紧张局势，这种密切联系不只是因为历史形成的联系，也是因为这些国家与欧洲共同体之间的互相联系关系。最后，它使塞浦路斯岛上的友善人民遭受严重的苦难，使他们的生命、财产受到严重的损失。

安理会已屡次审议过塞浦路斯发生问题的原因，在这一点上我不想多说了。不幸的是，历史给该岛留下了分裂和猜疑的种子，使组成其人口的两族分离。前此的和解努力都没有达成我们希望看到的结果。

去年夏天的事件更加深了我们的关注。在老的、长期存在的问题上又堆上了新的问题。我在这儿只要提到难民问题——还不只是其人道方面。

安理会对解决塞浦路斯的危机所能做到的最有建设性的贡献是什么呢？就我国代表团来说，我们认为这个问题的答案是由该岛局势的特性来决定的。这些特性显示出，寻求和解的责任——只有和解能导致持久的解决办法——完全在于直接有关各方，尤其是两族的领袖的身上。

我国代表团深信，塞浦路斯的危机只能由上述各方在自由和诚意的气氛下，本着和解的精神进行谈判，才能解决。这种解决办法应当根据两个基本因素。

第一。应当保证充分尊重塞浦路斯的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的确令人鼓舞的一件事是我们注意到如本次辩论中各国代表的发言再一次显示出来的，大家都无不承认这项基本原则；此外，关于这一点，我很高兴地提醒安理会注意希腊和土耳其的代表在大会讲坛上所作的承诺。

第二。解决办法必须保障和彻底调和两族人民的权利、利益和合法的愿望。

因此，我认为联合国的任务和义务是创造有利于两族进行对话的条件以鼓励这种谈判。这是前此透过安全理事会和大会的决议所遵行的方式。我们应当继续遵循这种途径，不可感到失望，而要重申这些决议，特别是大会第3212(XXIX)

号决议和赞同这项决议的安全理事会第365(1974)号决议，并加以执行。

我国代表团仔细地审查过S/11624号文件内的秘书长特别报告，并且非常关心地听取了他对安理会所作的声明。我要特别对秘书长的不懈努力表示赞赏。我要提醒安理会，秘书长在促成两族领袖的会议上发挥了重大的作用；因此，我们有权希望——意大利代表团也最热诚地希望——秘书长的行动能够导致其他令人鼓舞的结果。因而，意大利代表团愿意赞同在本次辩论中发言的其他代表所提出的主张，设想由秘书长负起有助于谈判的恢复和进展的新的任务。

我也要非常热诚地感谢秘书长的特别代表韦克曼—穆尼奥斯先生，他以非常出众的方式进行了一项微妙而困难的工作。

最后，我要借此机会感谢联合国驻塞部队，他们的英勇、忠诚和高度的专业能力使塞浦路斯人民能够避免了更悲惨的苦难。

我也非常关心地听取并审查了塞浦路斯、希腊和土耳其等国政府的代表，以及土族塞人的代表切里克先生在会议过程中的讲话。对我来说，似乎在这些讲话中除了互相指责和争辩外，还可听得出来对于下列事实的承认：各方之间的对话仍然是解决问题的关键，而且是从僵局中重新寻求和平的解决办法的唯一希望。甚至在若干实质问题上，我觉得似乎也看到了一些迹象表示某种更具伸缩性的态度；不管这种改变是多么微小，我们都应当加以确认和鼓励。

自从去年夏天的事件使塞浦路斯的局势展开了一个新的危急的阶段以来，意大利一直持续努力以鼓励各方采取温和的态度，仔细考虑，并以谈判解决他们之间的分歧。这种根据我国同有关各国的良好关系而进行的双边办法同在欧洲共同体九国政治合作的构架内共同采取的立场是同样的。

不久以前，事实上就在二月十三日，九国外交部长在都柏林开会。会后发布的公报回顾了联合国的有关决议，其中最后一段说：

“他们继续认为极需通过塞浦路斯两族之间的协商，寻求一个持久的和公正的谈判解决办法。

“为了促进这个目标的实现，九个国家愿意同所有有关方面的代表进行讨论。”(S/11629)

这个声明，和意大利外交部长鲁莫尔先生与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外交部长根舍先生在罗马举行的会议结束后，于二月二十一日的公报中就这件事所作的另一声明，都证明我们继续准备——安理会应当记住这种意思——为塞浦路斯危机的各方国家服务，因为，如我已说过的，这些国家同欧洲共同体之间有着特别的联系关系。

如我刚才强调的，我国政府相信只有通过两族之间的谈判才能解决塞浦路斯问题，因此我们仍如以往一样继续反对任何单方面的行动，这种行动很可能预断了应当据以进行谈判的那种选择办法，因而使寻求谈判的解决办法更加困难。

关于过去在塞浦路斯问题上造成了严重危机的局势的这种单方面行动，我们曾表示了这种信念；今天我们声明这种立场是鉴于最近土族塞人社区的领袖所采取的决定，这种决定虽然作为内部发展提出，但已导致了谈判的破裂。在这方面，意大利代表团愿意回顾登克塔什先生在塞浦路斯和切里克先生在这儿所作的声明，大意是说那项决定没有造成使谈判不可能恢复的最后局势；我们希望他们所作的声明会得到事实证明。

最后，我国代表团希望所有关系方面都有准备表现出适当的诚意和伸缩性以恢复两族之间的谈判。面临着其人民受到新的哀痛、苦难的悲惨前景，我深信两族领袖将遵循现实主义、和解精神和必要的想象力，在合理的时间内，就问题的所有各方面达成一般的协议。

最后，我要强调在这件事上时间是最重要的，因为目前事态的延续只会妨害谈判的恢复，使谈判更加困难。

主席：现在我还要通知安理会，我收到了沙特阿拉伯常驻代表的信，要求根据宪章的有关条款，邀请他参加我们的讨论，但没有表决权。按照安全理事会暂行议事规则第三十七条的规定和惯例，我提议邀请沙特阿拉伯代表参加讨论，但没有表决权。

没有人反对，就这样决定。

应主席的邀请，沙特阿拉伯代表，巴鲁迪先生在安理会议席就座。

主席：现在我请沙特阿拉伯代表发言。

巴鲁迪先生（沙特阿拉伯）：主席先生，安理会各理事国，我谢谢你们让我出席就正在审议的问题发言。主席先生，作为一个亚洲人，我要说我很高兴看到你担任安理会主席。以你的洞识和沉着，再加上可以从一个不只对亚洲也对全世界有极大贡献的文化精华吸取经验，我确信最后你或许能够把安理会成员导向做出必要的行动，找出这个棘手的问题的实际的解决办法。

用不着说，作为从一开始就在那儿的人，我要称赞所有最近和以前担任过主席的理事国对安理会工作的热诚，而不分别指出他们每一个人的名字。

我为什么要发言呢？只为了再多说一些已经说过的话吗？我必须对我这儿的同事坦白地说，我认为他们大部分都是在说老话。关于就这个问题所通过，并经直接有关各方所同意或接受的决议，应当做些什么，我们已经听到很多了。用不着说，他们应当遵守该决议的规定。

问题不仅在于这项决议的解释，还在于发生了什么样的情况使得某些有关方面认为这项决议只是一种镇定剂，而没有触及问题的根源。碰巧塞浦路斯位于我所属的区域。

请主席先生和理事国的成员们准许我向你们讲点塞浦路斯问题的背景。我将不象可能有些人所料想，去追溯被希腊人称为腓尼基人的卡安那尼特的时代，或更往前追溯到亚述人和法老一度占领塞浦路斯的那个时代。那是古老得多了。我

们将只追溯到一八七七年。我想有些同事明了我提到一八七七年意义。

一八七七年发生了欧洲各国对于奥托曼帝国事务的实际干涉。当然，有些人可能说，奥托曼人来自亚洲、占领安那托利亚、一度到达维也纳的门口，是扩张得太远了。但也不要忘了所有欧洲人都来自亚洲，他们具有印度—欧罗巴族的血统。因此，我们不能说虽然没有明文宪法但仍是第一个联邦的奥托曼帝国无权拥有当时认为是属于它管辖的地方。我不是在指责欧洲人，因为现在再来说我将要说的话是太迟了，不过，这些话将提供一些线索，说明为什么我们会受到现在亲身遭遇的痛苦；而且，坐在我左边的瑞典大使说得对，我们应该专注人道问题，而不是政治问题。

但是，如果能知道不是这个问题的古老根源，而是一八七七年时这一问题发生的原因还是有用的，当时沙皇俄国试图侵占构成奥托曼帝国巴尔干半岛部分的塞尔比亚和保加利亚。现在，你们或许会说：“这件事和这个问题有什么相干呢？”当然，它和这个问题有很大的关系。被激怒的不正是名为联合王国的这一个岛上的政府吗？他们想要确保俄国不能经过达达尼尔海峡进入地中海。为此他们作了些什么呢？他们派出战舰到马尔马拉海。换句话说，他们通知俄国，如果俄国进入地中海的暖水，他们就不惜一战。

苏丹·阿卜杜·哈米德——但愿神明保佑他的灵魂平安——有人叫他红苏丹，血腥的苏丹，这都是宣传，宣传是早已存在的了——他想要保全他的帝国，正象英国的帝后或法国的波旁王族想要保全帝国一样：我想多少是一样的程度。那时候的我们的英国好朋友——我应当说目前我们的朋友，而不是那时候的朋友，因为当时他们是殖民主义者——为什么要阻止俄国进入地中海呢？那是因为当时他们控制着一个次大陆——就是印度——他们宁愿有一个衰弱的奥托曼帝国，而又要它并不太弱，也不太强。他们怕如果它太弱的话，俄国人会吞并它。如果它太强的话——就象有一次埃及总督穆罕默德·阿里派出伊卜拉欣·巴夏几乎占领了孔亚时那样——就会取得新血

而复兴。

所以帝俄和联合王国——当时大概是帕默斯顿任首相——都分别警告埃及的穆罕默德·阿里，（他是苏丹的副手或总督之类的人）说：“如果你不撤军，我们就要向你开战。”他们想要的是维持力量的均衡。我希望你们懂我的意思；你们会看出这与目前局势的关系。

那时候俄国人很明智，他们没有去夺取博斯普鲁斯海峡、达达尼尔海峡和马尔马拉海。在安排了许多次会议，或者说私下会谈，最后在一八七八年的柏林会议达到高潮后，并由于英国的从中斡旋，苏丹把塞浦路斯暂时租借给英国，但没有丧失奥托曼的主权。此后苏丹每年收取一笔塞浦路斯的租借费。有一阵子是 50,000 英镑；另一阵子是 90,000 英镑。如果说错了，请指正。但是那时候英国很富裕，我不认为他们从人民那里收了这么多税，而力量的均衡就维持住了。

但是，四年以后——在一八八二年——英国占领了埃及。他们当然有借口——伊卜拉欣·巴夏的事件等等。埃及成为被保护国。这件事和工党无关，当时还没有工党。只有帝国主义者。当我们也有一个帝国的时候，我们也是帝国主义者。我指的是阿拉伯人。让我们摊牌直说吧。这或许是一件好事；它使阿拉伯民族主义从那时候，一八八二年起发动起来了。贾马尔·马德·丁·阿尔·阿法加尼是一个住在埃及的阿富汗人。一个阿富汗人在英国占领埃及以后发起了这种回教——阿拉伯民族主义。

那么这又使谁与英国不和了呢？很自然的，是土耳其人。毕竟，我们把塞浦路斯租借给他们，而现在他们占领了埃及。这些事都发生在我的区域里；我生于一九〇五年，成为奥托曼臣民，当时是苏丹·阿卜杜·哈米德统治。我研究这些事不只是从书本上，也从与苏丹同时的人那里——尤其是他的亲侄儿，他的亲侄女，我同她和她的家人都很熟悉，她就是“青年土耳其”的恩弗尔·巴夏的遗孀。我也加上了自己的判断。我是阿拉伯人，而土耳其人是土耳其人，有时候土耳其人

与阿拉伯人之间有某种猜忌，这是很自然的，因为奥托曼帝国内有许多种社区。

后来发生了什么呢？德国皇帝威廉二世开始同苏丹勾搭。他的第一次访问是在一八八九年——如果我错了请指正。他的第二次访问是在一八九八年。你们都知道关于兴修通到波斯湾去的柏林——巴格达铁路线的事。这使英国人不安，英国人说：“如果他们去到波斯湾，然后到苏伊士，天啊！德国人”——那时候是德国人，不是俄国人——就能切断我们到印度的通路，如果他们切断我们到印度的通路，就会发生什么呢？我们的利益就会受到损害。”就这样，德国与土耳其——更准确地说，与苏丹有了非常亲善的关系。

后来在一九〇八年苏丹被废了。现在我们不必再深入土耳其历史来探讨“青年土耳其”的出现了。他们在法国有些组织。其中有些可以称为法国革命的精神继承人，他们想要改变。无论如何，苏丹在一九〇八年被废。

然后就是欧洲各国的争闹。为了什么呢？反对德国军国主义？不是的。当时法国是最大的军事强国——虽然有着在俾斯麦以后的时期和威廉时期兴起的德国闻名的严明纪律——而最大的海军国家是联合王国。美国当时还不是一个大国。它只能顾到自己。这是在一九一七年以前，因为那时候美国被拖入世界大战，我也不必告诉你们是谁拖的了。但是联合王国有最强大的海军力量。我并不认为德国人是圣人。他们也试图用老式殖民主义的方法来扩充领土。在那儿呢？在非洲，如果可能的话，也在亚洲。当时英帝国的面积超过400万平方哩，法帝国则为360万平方哩，而德国拥有其余——大约100万平方哩，大部分在西南非洲，现称纳米比亚的地方，当时是德国领土，以及今天的肯尼亚和某些其他国家所在的几个地方。事情就是这样。

因此，德国也希望有一块照到阳光的地方——打个直接的比喻。他们追求光荣，而战争并不是为了反对德国军国主义，而是反对德国重商主义，因为他们侵入了印度和拉丁美洲的市场。而我们都知道，在很大程度上，战争与经济有关。有

一次，我的好友马立克大使告诉我说，这是马克思主义。这是在马克思主义之前，远在马克思主义之前。战争主要是经济性的。偶而会有象亚历山大大帝和拿破伦这样的人，热中于权力，但基本上战争是经济性的。但这并不排除爱好权力和光荣。

美国使得协约国，就是英国、法国和其他国家，能够战胜德国。而由于这一事实，在一九一四年，租约就换手了，塞浦路斯落入英国手中，成为英国的殖民地。英国不再把5万或9万英镑的租金送交伊斯坦堡。塞浦路斯成为帝国整体的一部分，并有一个总督。我记得一九二〇年代的塞浦路斯总督——当时我还是个年轻人——直接由英国人统治。

这是不加增减的客观的历史。或许我们还可以补充几件事，但是这可能不必地使这儿的一些人不快，所以我不提这些令人不快的事了。

最后，我要提到国际联盟一事无成，美国总统威尔逊先生伤心地离开凡尔赛。他宣布了民族自决的原则，克莱蒙梭先生抓住他的领带，差点就勒死他。当时在凡尔赛的人告诉我这件事情。克莱蒙梭告诉威尔逊先生说，“你从那儿来还回那儿去吧”——这是我的解释。他们忘记了：如果没有美国，他们准吃了败仗；就不会有什么希特勒了；就会有德国人和欧洲各族人先后起来反抗他们。但这种事情不曾记在书里边。为同盟国赢得战争的是美国。

这一切和塞浦路斯是怎么连上关系的呢？当时的背景如下。当时我们——包括因职务而成为国际联盟的观察员的我在内看穿了这个骗局。我们发现战争不是为了保全民主，而是为了维护帝国。我们是否忘记了已故邱吉尔先生即使到了一九五〇年代还说，“任命我当英王陛下的首相并不是要我来主持英帝国的解体”呢？民主在那里？自决在那里？我们醒悟了。我们之中有很多人更早就觉悟了。因此，责任便落在象我巴鲁迪这种人身上，我在一九四八年和一九四九年从夏幽宫大会开始，便不嫌烦琐地把已故威尔逊先生所宣示的民族自决原则详细拟订为一种具体的权利，目前它已列入我们为它努力了十多年的两项国际人权公约的第一条。而且当时我

们不得不同我们的英、法好友和同事较量，最后他们不能不认输。我们精神为之一振。有一次，塞缪尔·霍尔爵士告诉我说，“这是含糊的原则；不能说成是什么人权”。几年后，我在伦敦提醒他说，英国议会同我们法国朋友的下院一样，也提到了“民族自决权”。

现在说到，民族是什么构成的？这是自决权的要义。民族有其共同点，有时是语言，通常是同样的语言；有时是同样的生活方式、地理、食物。这一切都是形成一个独特民族的因素。不需要样样划一类同。不，区域再小也是不同类的，有方言，有城乡居民的不同的生活方式。撇开共同的生活方式不谈，如果不是共同的利害关系，是什么构成一个民族呢？以联合王国为例，有苏格兰人，有威尔士人，还有康沃尔人。还曾有过爱尔兰人，不过现在不谈爱尔兰，那儿还有问题呢。但就拿我说过的来看吧，他们有共同的利害关系，因而组成一个民族。

今天，我同比利时同事谈过。我说，“比利时的华伦族情形怎么样？”他们和讲法语的人有共同的利害关系，共同组成一个民族——比利时民族。

现在谈到塞浦路斯是个民族聚合体。不要以为只有土族和希族。有些许是“土族化”了，有些许是“希族化”了！我们知道有来自黎巴嫩的马罗族和来自叙利亚的叙利亚族都成了塞浦路斯人了；希族成了塞浦路斯人，土族也是的。他们有共同的生活方式，共同的利害关系，使他们成为一个民族。当时要我们在联合国的人处理这个问题，是以这种观点为基础的。关于这种事，并不是因为我要谈，而是因为有人想知道我的意见。在这儿，我要你们，主席先生和理事会的成员们，很小心地注意：在一九五〇年代早期找上我来高谈塞浦路斯的独立的绅士，正是坐在克莱里季斯先生后面的那位齐农·罗西德斯先生。我们听到了。当时，我问，“那么，谁将扮演维尼齐罗斯的角色呢？”你们知道谁是维尼齐罗斯。他是个热衷于希腊民族主义的理想家，受谁煽动的呢？是已故洛伊德·乔治先生，搞煽动是为了进一步削弱土耳其。他挑动许多希腊人的幻想，使他们误以为可以分出安那托利亚的一部分而重新组成古希腊帝国。古时候可没什么希腊帝国；我们

都知道，是有过城邦，但没有什么希腊帝国，亚历山大帝国是例外，而他以卅二之年死于印度。

这一美梦成了恶梦。许多希腊人作为奥托曼公民平静地生活着，甚至在奥托曼帝国出现前，他们就在那里了；我已说过奥托曼朋友是来自亚洲北部的。他们与奥托曼人和睦相处。为了供你们参考，以便说明土耳其人并不偏狭，而且很能容忍宗教上的异己，我要告诉你们，伊普拉欣·帕沙——如果我说错了就改正我——他是号为“大苏列曼”苏丹的首相，就是个希腊人。伊布拉希姆·帕沙是个希腊人。我记得苏列曼好象娶了他的妹妹为妻。

有许多亚尔美尼亚人当了部长。有个来自黎巴嫩名叫苏列曼·埃尔·布斯塔尼的马罗族基督徒当了邮电部长。又有名叫法里斯·贝伊·埃尔·古里的，后来当了叙利亚总理。他曾是下院议员。我认得他。在亚尔美尼亚人受到欧洲人的鼓励受了许多罪以前，是没有什么大规模的宗教上的不容异己的，为了瓜分奥托曼帝国，欧洲人还煽动了一些黎巴嫩族基督徒。我不相信任何人能反驳我说的这些！

但我们并不是在吐苦水。我们是在说明塞浦路斯局势的背景。

现在有个叫塞浦路斯人的民族。在一九五〇年代后期或一九六〇年代初期——我记不清楚了——有个已故的佐尔鲁先生，当时他是个外交部长。如果说土耳其人做了一件错事，那便是他们把这位绅士同蒙德雷斯一起处了绞刑。我和他很熟悉。他是个好人。他邀请我们——我不是说些空话，我说的是事实——到座落在苏顿街的埃新大使公馆。当时有其他的大使在场。埃新大使告诉我说，“部长想在喝过咖啡后见你。”我就留了下来。他说，“我晓得你在联合国参与把自决原则拟订成一种具体的权利。你对塞浦路斯问题有何高见呢？”我答说，“我得请示我国政府。”他说，“问的是你个人的意见。”我就说，“不分治，不‘希塞统一’。”“希塞统一”就是同希腊联合。“让塞浦路斯人民决

定自己的命运和自己的生活。”这是目标。我们阿拉伯人基于通达的自我利益，并不主张分裂。我们有过巴勒斯坦被瓜分的悲剧，我们不认为朝鲜应该分裂；我们不认为德国应该分裂。分裂是个祸源，合乎大国的利益。

我们自己相信团结力足以在一个区域内形成一个民族，按照民族自决权取得独立。

那是我当时所说的话。他问，“对土族怎么办呢？”。我说，“你想要他们住到土耳其吗？”。他说，“不，不过他们是土耳其人。你知道，人是会感情用事的，那是很自然的”。我说，“我所说的是根据这样的假设：没有人将伤害任何其他的人，宗教容纳将更普遍，就象奥托曼帝国时代一样。我们生活在这个区域，我们不愿看到塞浦路斯变成大国“在地中海”的基地”——我无需举出他们的名字；人人都知道它们是谁。

他告诉我说，他认为我所说的相当合理。我告诉他说，“不要把我说的当成沙特阿拉伯政府的政策，因为我不曾接到关于这个问题的指令和训示”。他说，“说出来供你参考参考，你所说的和费萨尔王子陛下的政策相符——当时他还不是国王；他是外交部长。我说，“我很高兴听到这一消息”。

在这种基础上，同我们的希族朋友、我们的土族朋友进行了谈判；事实上，我亲自参加了一些谈判。曾经有人向我说——我不是在泄密，我忘了这个人的名字；那是个长长的希腊人名字：“你知道，有时候希族塞人兄弟们比土族使我们更感头疼”。因此你们可以明白他们对土族多么具有好感！

如果这些人民不受外来干涉，就不会有什么事发生。鼓动重新提出希塞统一观念的这位桑普森是谁呢？“桑普森”是安格鲁·萨克森族的名字。他是希腊人吗？我不知道他是谁。

当时我碰巧在这个区域。他们要杀害国家元首。格里伐斯刚刚死去。然后是某一个人出现，为希腊人、土耳其人、希族塞人和土族塞人制造出这一切麻烦事。一个人和他周围的一伙人竟然这么存心不良，搞出国际事件来。

但是谁在为它们撑腰呢？我不想说出来。为什么呢？因为伤口在那儿。把盐撒在伤口上面有什么好处呢？总之，互相指责与控诉能符合什么样的目的呢？我听到过这种讨论，有时候我甚至参加了讨论。它们毫无用处。有一些人在幕后操纵。那时我碰巧在黎巴嫩，我张着双耳听。塞浦路斯离黎巴嫩并不很远，你们都知道。

它是个存心不良的计划，不管是谁推动的；它是个不人道的计划。为什么说不人道呢？因为我想起了瑞典代表提到的难民们。拉线的人是安全的。受难的是谁呢？是人民。我不管他们的族源是什么，他们是人；他们不管是什么肤色，都是我们的兄弟。

怎样解决这个问题呢？这个不希塞统一、不分治的基础是不容变更的，因为如果变更了它，则昨日的灾祸就会持续到今后；伤口势必会溃烂。我们是谁，怎能告诉土族兄弟或希族兄弟说，“你们应该这样做呢？”小心啊，幕后操纵的人！不要再拉线了。我们在越南所看到的还不够吗？我们在柬埔寨看到，并且继续在看见的，还不够吗？我们在老挝所看到的还不够吗？人们受的苦难还不够吗？

我们这儿有个人权委员会，我们详细拟订了一项《人权宣言》和《国际人权公约》。“读之令人心喜，验其效用则令人生悲”。

各大国在地中海争权，搞的是老把戏。我以我的高龄警告他们的领导人不要继续干这种事，因为以不正义为基础的任何事物迟早会动摇、倒塌。我已看到一些帝国因不正义而覆亡。没有什么可以胜过正义所规定的。

我们请问秘书长——这位正成为当代的马科波罗的绅士——跑来跑去为的是什么？他能做什么？我决不是怀疑他的善意。他来自世界上最文明的国家之一。我曾经想，“天哪！庞大的奥匈帝国缩成小奥地利了”！但奥地利的真正的光荣在于它保有人道主义，并且不沉醉于过去几世纪的虚荣。但是我们的秘书长能做什么？就只是在希族领导人和土族领导人之间，在登克塔什先生和马卡里奥斯大

主教或克莱里季斯先生之间，或任何代表两族的人之间来来去去吗？没有必要的善意，是什么也做不成的。

我要警告那些拉线的人——我不欲举出他们的名字：你们的手指会被绳线弄伤的，最后你们会发现再不会有手指好拉线了，因为你们播下了灾祸。我要向阿拉伯人民说同样的话，如果他们也拉什么线的话。不要以为我目中无人。解决这种问题的陈旧办法走了火了。一些历史家们——主要是欧洲人——说过，维也纳会议带来了和平。当我在英国和其他地方时，我常说，“和平？维也纳会议？”一位名叫亨利·基辛格的知名绅士现在说，和解带来和平。但是，除非有诚意，否则和解是无法带来和平的。塔列兰德和梅特尼克干了些什么呢？他们在欧洲划分势力范围。而后发生了什么呢？是不是一切都顺随人意——如美国人所说的——呢？不是的。

其后，发生了一八三〇年和一八四八年的革命，接着是普法战争，而后是土耳其和帝俄之间的战争——俄国人战胜了，塞浦路斯被作为和解的酬劳品。然后有法肖达，法肖达之后有一九一一年的巴尔干战争，接着是波尔战争——我没照年代次序列举——而后在一九〇五年发生了中日战争，这次战争也是由一些外来的大国在操纵。然后在1815—1914这一百年——确切地说是九十九年——的和平世纪过去以前，又发生了两次世界大战之中的第一次。

没有正义的和解就象在现代想用——照我们阿拉伯话说——瓜皮膏药去治疗一些病毒一样。发病的地方是血液，就得使用抗生素，瓜皮膏药是治不了的。

现在，你们大国——一个或更多的大国——不管那一国，为了“权力均衡”和“势力范围”而在幕后操纵的列强应该知道，一方面你们不应责怪土族要求成立联合邦或无论什么名称——我不以这些名称作准的——因为我知道有许多土族被屠杀了；同样地，我也不能责怪希族忧虑分治之后他们会被削弱。

但是，我要求当事双方都稍微注意一下这样的事实：时至今日他们不应受到炮舰外交的操纵；这种日子过去了。在情报局能够在任何国家内部暗下颠覆并扶植活动份子的时候，为什么要有炮舰外交呢？他们应留心使——我不是在批评或处方——他们自己不成为强权政治和势力范围等等过时办法的牺牲者，而是要使他们——希族、土族、黎巴嫩族基督徒以及其他各族——象未有西方列强和帝俄干涉其事务时的王朝时代那样，兄弟般地生活在一起。当然，其间也曾有过暴乱行为。十九世纪不是历史上的黄金时代，即使在夸称“文明”的西方也不是。

我曾在萨沃伊旅馆逗留多年，研究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上层社会、统治集团、贵族们不知道斯特兰德左边的卡文特加登现址——不如说是旧址，因为我相信他们要把它迁走，就象法国迁掉勒佐尔一样——发生了什么事。他们不了解穷困、贫民窟。老实说，他们是不知道的，或者知道而故作不见。

只是在这个基础上，在善意和重新建立两族相互信心的基础上，不管任何一方想要什么，请你们双方——我指的是当事双方——不要态度僵硬。尤其要留心不要让任何人牵线害人——不是说害了你们坐在这里的人，因为你们总是可以想办法向各国政府那样——而是说害了那儿的人民，使他们遭遇不幸。

我应该再度感谢主席先生的宽容和各位先生们的耐心。但我终究认为，大家都毫不例外地雄辩过了，就该振作起来想个新办法。那些背后操纵的人尤应小心，因为常此以往他们会象做过同样事情的其他国家一样动摇倒塌的。

主席：现在，没有其他的发言人了。因此，我准备宣布散会。在宣布散会之前，我愿感谢成员国代表在发言中向中华人民共和国表示的友谊。鉴于明天——也就是星期三——没有人要求发言。经过与安理会各成员国协商的结果，大家同意下次会议于二月二十七日星期四下午三时举行。当然，安理会成员国可以利用这段时间进行会外协商。

下午六时正散会